

李学勤 主编

中国学术史



(上)【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王志平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学术史

李学勤 主编

三国两晋
南北朝卷
(上)

王志平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2637

总序

研究中国学术史,写出一部《中国学术史》的想法,在我的心中酝酿,可说已经有二十年了。这一设想的萌芽,还是从我多年从事的先秦历史、考古方面研究开始的。记得在“文革”终结后不久的1981年,第二次“先秦史学术讨论会”在陕西西安举行,我作了一个题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发言^①,其中一节就叫做《学术史与古代文明》。

当时我提到“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我国的古代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有数几大远古文明之一,久已蜚声于世。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有种种不同的见解,当时文明的辉煌绚丽,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特别是考古学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使人们对古代中国的认识耳目一新。然后尽管如此,长时期以来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估价是很不够的,“为什么学术界流行的传统观念总是把中国的古代文明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呢?我们觉得,这有着深刻的学术史上的原因”。因此,虽然我主要研究的是遥远的古代,却不能不同时将眼光注视到后世甚至是现代的学术史。

这一点对我的业务工作来说,很重要。我反复考虑,逐渐明白了学术和历史的关系。学术,不论是其整体,还是各个分科,都是在历史上产生的,有着兴起、发展及演变的过程。认识学术,必须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评价学术,也不能离开历史的情况与条件。这样说,当然不是把一切学术都作为意识形态来看待,只是说明学术有着自身的历史,同时又难免受到整个历史的影响和限制。研究学术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学术,这就是学术史。

在这里需要说一说什么是学术。80年代有过什么是文

① 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载《人文杂志》专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

化的热烈讨论,那时我曾戏仿禅语说:文化这个词,不讲人人明白,越讲越不明白。学术这个词,或许也是这样。不过在近些年,国内有一种趋势,说学术似乎一定不包括自然科学,学术与科学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这在字面上、内涵上都是不合适的,用在现代以前的学术上尤其不妥当。有学者主张,科学和技术应该区别开来^①,这样讲的科学更应算在学术以内。我们讲的学术史,用现代分科来说,包括文科、理科等的历史。

几年前有一场学术与思想的争论。一些论著提出,学术有别于思想,学者不同于思想家,甚至在论文的分类上都有学术与思想两途。揣想这种看法的起源,是要强调理论性、根本性问题的重,但强将学术、思想划分开来,是不合实际的。我有一次提到,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专门以思潮相标举。至于后来的思想史著作,核心是哲学史,便不是涵盖全面的学术史了。

真正的学术大家,没有不具有深刻而系统的思想的。历史上的学者,有些于当世文化知识无不通习,如中国的朱子、英国的培根,固不用说;现今的学者,也多在专门的学科上有其高瞻远瞩的思想观点,连自然科学家也不例外,有谁能说爱因斯坦、斯蒂芬·霍金等不能称为思想家呢?

人类的知识本来是整体的,学术在任何历史时期也是整体,只是由于具体个人的能力有限,难以窥其大全,才根据知识的结构分立为若干学科。也正因为如此,不同学科有许多交叉搭界、无法割裂之处,而新的学科每每即于学科间的边缘创造出来。全面地、整体地研究学术史,能够更好地看到学科间的关系,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学科学者间的关系。在多学科交叉已成为学术进步趋势的今天,我们的研究更必须注意这一点。

① 吴大猷:《近数百年我国科学落后西方的原因》,载《易学与科学》1997年第1期。

大家知道,学科的精细分化主要是近代的现象,所以研究古代的学术史,特别有必要从整体出发。现在探讨古代学术的作品,一般是以现今的学科作为出发点。例如今天有力学,就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寻找与现代力学有关的观念和发明,从而构成了中国力学史。这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足以揭示古今学科的关联,并对古代的成就作出估价,然而古代何尝有力学这一学科?有关材料只能由种种文献爬梳辑集,其在当时学术中的位置如何,与当时学术其他方面的关系如何,很难从今天力学的范畴来说明。

由此可见,学术史研究不仅需要是全面的、整体的,还应该是历史的。我们应当按照历史上学术的本来面貌去观察。十年以前,在纪念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 90 诞辰的研讨会上,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炳郁教授曾就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讲过这样的意见。我觉得,他的见解对整个学术史都是适用的。

中国有研究学术史的优良传统。前文提到的梁启超的两部书,可说是现代意义的学术史专著的开始。另外,章太炎的不少论著,其实也有同样的贡献。至于历史上学术史性质的作品,追溯起来可以早到晚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卢钟锋先生的《中国传统学术史》^①,是一部很好的中国学术史。他所论及的历代学术史性质著作,上起《庄子》的《天下》篇,下迄徐世昌所纂《清儒学案》,有五十五种之多。分析这一系列著作,不难发现,其中意义最重大、内容最精彩的,无不作于社会及文化的历史发生剧烈转折之际。

产生在周汉间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以及《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述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分别自儒、道、法等家观点,回顾和总结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为后人描绘了这一“枢纽时期”的绚丽画卷。

^① 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草创于南朝末,成书则应下及唐初。其《序录》对汉代以来占主要地位的经学,以及《老》、《庄》注释,作了条分缕析的叙述,“以著述早晚,经义总别,以成次第”,其体例为后来类似作品所遵循。

理学风气兴于宋代,历元至明,发达到了极点。明清之际,学者遭遇了被形容为“天崩地解”的变故,不得不对学风痛加反省。此时出现的黄宗羲《明儒学案》,和黄宗羲至全祖望多人纂成《宋元学案》,无论从内涵之丰富,还是识见之精卓来看,都堪称传统的学术史作品的顶峰。

更大的历史与文化的变革,如所周知,发生于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即应此时运而问世。梁氏的两本专书虽出于20世纪20年代,但他在1902年已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发表^①,成为他这方面研究的先声。

自1902年到现在,差不多又是一百年了。在新的世纪之交的当口,中国以及世界正在经历更深刻、更重大的变迁。面对新的挑战,我们的学术界已经意识到有再次回顾和反省的必要。我想,这便是近几年学术史工作,包括材料的整理、个案的讨论、分科的总结、整体的鸟瞰,一下子都成为热门的原因。

当前要做的学术史研究工作,以我的陋见,不妨归纳为两条:一条是重写学术史,另一条是续写或新写学术史。

历史作为已成既往的客观真实,是不能加以改变的,而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却因学者所凭借的材料、所依据的理论及方法,经常变易更新。如去年在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不少先生指出的,目前重写学术史的条件已经是具备了。

就我个人长期投入的学科领域来说,近年田野考古发现的古代简帛佚籍,其性质实在是令人深感震撼的。这大量的宝贵发现,使晚清以来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好多学术史观点,顿时不能成立了。过去被认为没有什么可供论述的,

^①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

如孔孟之间的儒学、黄老一派的道家、数术与兵阴阳家等等，都有了足以凭信的材料。涉及先秦“枢纽时期”的学术史问题，很自然地又影响到对秦汉以下各代学术流变的看法。关系着历朝学者争论不息的若干疑难，像汉学、宋学的问题，今文学、古文学的问题等等，都有了重加考虑的必要。当然，这只不过是表明学术史应该重写而举的一个例子。

相对于古代学术史来说，近现代学术史自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不管是汉宋学问题、今古文问题，还是什么，与当前学术的关系均已淡远，即使是梁启超著作中畅论的种种，和今天也有距离。与今天的学术存在直接联系的，乃是近百年的学术史，这便不是重写，而是续写或者说新写学术史的问题了。

研究历史的人都能理解，讲现代的学术史重要，不等于现代以前的学术史不重要。历史研究的价值，正建立在历史本身的连续绵延之上。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由上古至今传统未曾断绝，研究近现代学术仍不能离开对整个学术演变递嬗的概观。

我们这部十一卷本的《中国学术史》，就是重写中国学术整个变迁的一次尝试。

撰写的准备和设计，始于1993年。有关中国学术史的一些想法，得到多位专攻学术史的年轻学者的支持，也幸获江西教育出版社各位先生的许可，这样“中国学术史”即作为工作课题而成立了。应该感谢参加本书撰述的诸位，他们在各自岗位的繁重事务中尽可能集中时间，确实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老实说，当着手组织这部《中国学术史》时，我心中颇有些忐忑。我一直认为学术史应当作为一项艰辛的研究，不可限于史实材料及已有观点的胪列。用在中国科学院朋友中流行的话来说，是不赞成“以编代研”。不过，中国学术史范围辽阔，想全面论述又绝非短短几年所能完成。为此，我建议《中国学术史》采用勾画轮廓、选择重点的方式，以叙说各

历史时期学术发展的大势为主,这部书便是依此而著成的。

中国人一贯主张治史的目的在于鉴今,司马光的著作《资治通鉴》,突出地代表了这个看法。窃以为不能以这一点要求所有历史研究,有的研究的动机恐怕还只是求知。但是,学术史的研究确是有这样的效用的。重写和续写学术史,将有益于新世纪中国学术的创新。假如这部不够成熟的书能于此有一些贡献,我们便十分满足了。

李学勤

2000年8月11日于清华园

目 录

总序	1
----	---

引子 三国、两晋、南北朝学术概述	1
------------------	---

第一章	5
-----	---

三国时期的经学(上)

第一节 汉末至三国时期的经学概述	5
------------------	---

一 汉末至三国的学术大势	5
--------------	---

二 汉末经学的新特点	7
------------	---

三 汉末至三国学术的复杂性	13
---------------	----

四 学术流派的纷争与消长	15
--------------	----

第二节 汉末至三国的经学流变(上)——官学	18
-----------------------	----

一 汉末至三国的学术氛围	18
--------------	----

二 荆州学派	20
--------	----

三 荆州学派的人物	22
-----------	----

四 荆州学派的学术特点	29
-------------	----

五 交州学派	35
--------	----

第三节 汉末至三国的经学流变(下)——私学	38
-----------------------	----

一 郑玄学派	38
--------	----

二 荀氏家学	69
--------	----

三 虞氏家学	74
--------	----

第二章 82

三国时期的经学(中)

第一节 三国时期魏国的经学发展	82
一 三国时期魏国经学概述	82
二 魏正始石经	90
三 魏三体石经《尚书》的版本	92
四 魏三体石经《春秋》经传及其版本	100
五 魏三体石经的书人与书体	110
第二节 三国时期魏国的经学纷争与消长	118
一 曹氏与司马氏的学术纷争	118
二 魏太学博士制度	126
第三节 三国时期蜀国、吴国的经学概况	133
一 蜀国的经学概况	133
二 吴国的经学概况	136

第三章 140

三国时期的经学(下)

第一节 三国时期魏国的经学家(上)	140
一 王肃	140
二 王肃“多造伪书”考辨	145
三 王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165
第二节 三国时期魏国的经学家(中)	167
一 何晏	167
二 王弼	175
第三节 三国时期魏国的经学家(下)	184
一 魏国的“儒宗”	184

二 魏国的家学与私学	192
三 魏国经学的余支	202
第四节 三国时期吴国、蜀国的经学家	206
一 吴国的经学家	206
二 蜀国的经学家	214
第四章	223
两晋时期的经学(上)	
第一节 西晋时期的经学概况	223
一 西晋太学十九博士	223
二 西晋国子学博士等	234
第二节 东晋时期的经学概况	237
一 东晋太学博士	237
二 东晋的国子学与乡学	241
三 皇家讲经之制	245
四 魏晋之际的经学变革	246
五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经学概况	251
第五章	256
两晋时期的经学(下)	
第一节 两晋时期的经学家(上)	256
一 西晋初期的经学家——阮籍、嵇康等	256
二 郑冲及其他	260
三 杜预	263
第二节 两晋时期的经学家(下)	271
一 东晋初期的经学家	271
二 《经典释文》所录诸家	275

三 其他	286
四 十六国时期的经学家	290

第六章 292

南北朝时期的经学(上)

第一节 南朝时期的经学概况	292
一 宋代的经学概况	292
二 齐代的经学概况	296
三 梁代的经学概况	305
四 陈代的经学概况	308
五 南朝经学综述	310
第二节 北朝时期的经学概况	312
一 北魏时期的经学概况	312
二 北齐时期的经学概况	325
三 北周时期的经学概况	327
四 北朝经学综述	327
第三节 南北朝学风异同	330
一 南北朝学风差异	330
二 南北朝时期诸经的兴废	335
三 南北朝时期的义疏之学	338
四 南北朝时期的礼服之学	344
五 南北朝时期的《论语》、《孝经》之学	349

第七章 354

南北朝时期的经学(下)

第一节 南朝的经学家	354
一 宋代的经学家	354

二 齐代的经学家	357
三 梁代的经学家	362
四 陈代的经学家	378
第二节 北朝的经学家	391
一 北魏时期的经学家	391
二 北齐时期的经学家	413
三 北周时期的经学家	419

引子 三国、两晋、南北朝学术概述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纷乱的一个时期。国家分而复合，合而复分。同时王朝更迭、国家兴替，层出不穷，兵连祸结，民不聊生。但是正是这种纷乱局面，促使了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又促进了北方民族的融合。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西晋一朝取得了短暂的统一以外，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南北对峙、长期分裂的状态。但是这种分裂并没有隔绝南北方的经济文化往来。即使是在南北对峙的过程中，双方也曾互派使者十余次之多，更遑论民间的交流了。

这一时期战乱频仍仍是不可否认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王朝都同时面临内忧外患的种种威胁，但是在远离战场的地区和暂无战乱的时代，经济和文化事业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以往人们出于正统史观的考虑，认为由于“五胡乱华”，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中衰时期、黑暗时代。事实上，即使现代史家以“中古”称呼这一时期，却并不意味着与西方历史上的“中世纪”这一概念相当。以往人们侈言“隋唐盛世”，却没想到隋唐的典章制度是来源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衰世”。自从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揭示这一事实以来，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盛世”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是来源于“衰世”的。由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史家早已改变了轻视这一时期、认为这一时期鄙薄无文的看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是历史上少有的文化开放时

期。由于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衰落,各种思潮纷至沓来;由于政治控制相对削弱,文化思想空前活跃。宋文帝立儒、玄、史、文四学还只是正统的学术,至于本土及外来的宗教——道教及佛教等更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佛教,自张骞西行,白马东来之后,还从未享受过如此的尊崇和荣耀。不少学者称这一时期为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是很有道理的。汤用彤甚至称这一时期为“启明时代”,^①甚有见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是很复杂的。过去研究中国社会分期的学者有多种看法。即使以“魏晋封建”说而论,也失之简单、偏颇。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接触汉文化前后,其发展阶段是很不相同的。汉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接受先进文明和先进文化的过程。如果笼统地谈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特点,其共同之处并不在相似的经济或者土地制度,而是贯穿整个时期的门阀制度。门阀制度即门第阀阅,是矜尚门第出身的一种制度。它表面上很像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度,但是宗法制度是与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度相联系的。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则来源于两汉时期的平民化社会,这一时期的世家大族都只是冒牌的贵族,与先秦时期的贵族貌合神离。这种冒牌贵族长期把持朝政,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②的局面。这样,这种情形好像与先秦的世卿世禄制度有些相似,但是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寒人掌机要”的特点却是先秦宗法制度中所罕见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社会毕竟还为庶族提供了一定的晋身之阶,这就是历史的进步之处。但是,从秦汉的平民社会发展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伪贵族社会,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其影响绵远流长,流毒无穷。

① 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7页。笔者征引原文,重在文字,标点断句多依自己理解,因而时与原书不同。以下仿此。

② 《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

类似于战国时期“尚贤”的呼声长期被忽视了,直到唐代科举制出现,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士族独霸的局面。而且门阀制度最终崩溃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战乱,士族被消灭殆尽之后,才出现了宋元以后的新型平民化社会。应该承认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在社会发展史上事实上是走了一个回头路。

在经济制度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已不局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东至辽河、西至凉州、南至江南,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江南地区,其经济发达程度已进入先进行列,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我国经济的重心也逐渐由北方转移到南方。这和北方汉族南下所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密切相关的。江南经济的开发是北方汉族侨居后与当地土著共同开发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开发,原先存在的一些土著少数民族逐渐被融合于汉族之中。由于南朝除南北边境战争及宫廷内部政变之外,绝大多数江南地区还是相对稳定的。即使是在战火所波及地区,战火不是规模不大,就是持续时间不长,对于经济生产的破坏相对较小,因而能够获得持续发展。其他地区也有长足的进步。除传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外,辽西地区由于中土人士为了躲避战乱大量迁入,“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①,辽西地区也像东晋南朝一样设立了许多侨置郡县,同时由于政策得法,鲜卑人与汉族流民得以安居乐业。由于汉族流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及丰富的生产经验,开垦荒地、种植品种及规模都较以前扩大许多。凉州地区也是如此,“中土避难来者,日月相继”^②。由于凉州地区政治相对稳定,战乱较少波及,所以也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开发区。同时凉州地区经济又自有特点,农业与畜牧业并重,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发展,因而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① 《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

② 《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

由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头绪繁多,不易把握,因而我们叙述的原则一般是先谈三国部分,再谈两晋,其次十六国时期,其次南朝,其次北朝。但尽管如此,由于有些人物和事件跨越两个时期,有时为了叙述的方便仅在某一相应的时期中谈及,他处就不再赘述。同时由于学术史内容广阔,本书大致上是以当时的学术概念来加以叙述的。当然,其中不无调整之处。南北朝时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学,宋明帝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而东晋李充又将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这大致是对当时学术的总结和概括。但由于文学已另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史,故本学术史不言文学。同时小学本为经学之附庸,因其内容较多,故独立述之。目录学本为史学之范围,亦同样因内容较多而独立出来。佛教、道教等宗教本应入诸子学部分,但一来因为内容繁多;二来宗教性质能否与学术宗旨相容,尚在未知之数。故凡佛教、道教等有关问题一并避而不谈,而仅在涉及相关问题时偶一提之。同样,诸子学内容广阔,今日科学史之内容旧多在诸子学中,但这与一般人言及诸子学多意谓思想史有关内容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按照当时习惯把科学史也纳入诸子学之中,但与之并列平行处理。当然,这样处理是否妥当,还有待于读者的反应和批评。

我们这样处理又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同一人物或事件有时分见于不同科目中。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采用史书中的互见法,标明有些问题在其他章节中会有叙述,这样一来可以节约篇幅;二来可以使读者可以参互阅之,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由于本书为学术史,对于这个题目感兴趣的读者,必已具备相当的历史学等基础知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就没有必要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王朝世系、年号、君王等等赘述一番。但是,需要提醒的是,这绝非并不重要,相反,它是对学术史感兴趣的读者需要首先加以注意的。如果有些读者对于这一时期的王朝更迭、世系交替感到目迷五色的话,那是需要查阅这一时期的相应的专著或者有关参考书籍的。